

扩大销售 疏通渠道 『憋死羊』没有憋死 肇源县为民解愁

本报讯 黑龙江肇源县积极为养羊专业户开辟城乡市场。近来，一度苦于销路不畅的4.5万只“憋死羊”已陆续出栏。

近几年，肇源县养羊业发展很快。1983年，全县养羊数由1981年的11万只增到20.6万只，出栏数增加一倍还多。过去，羊肉主要通过外贸部门出口。去年初，市场情况有了变化。一度毛停收、皮减价、肉卖不出去，一些专业户的羊开始成群变卖，刚刚兴起的“养羊热”有点变冷了。县委、县政府经过调查研究，决定放开手脚，广开城乡市场，为“憋死羊”寻找多条内销门路。

首先发展屠宰专业户，实行议购议销。去秋以来，全县发展了82户屠宰专业户，屠宰专业户和养羊专业户直接挂钩，三个月就议购议销了8,200多只羊。县城中心农贸市场，每天有议价羊肉上市。肇源县解放大队屠宰专业户徐文一人就议购议销了500

要在活字上作文章



肇源县积极开辟城乡市场，为全县4.5万只“憋死羊”找到了销路，这种做法值得提倡。类似肇源县羊只滞销的问题，在全国很多地方，很多品种都存在，解决这个问题，除要加强仓储、运输、购销等工作外，主要是在开辟市场上下功夫，把经济搞活。

近年来，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社会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有些地方某些产品积压，表面上看，似乎已过量生产，其实这是由于流通渠道不畅，没有向更广阔的范围开辟市场所造成的。尽管我国城乡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不算高，但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市场的潜力都还很大，社会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从整体看，应该说农副产品不是庆多，而是庆少；不是供大于求，而是求大于供。因此，我们应当把疏通流通渠道、开辟市场，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切实解决农民在许多农副产品上卖难的问题，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开辟市场，既要注意大中城市和远地的市场，使城市成为自己产品销售地，也要注意开辟本地市场。有些产品在本地有销路不大，其实主要是没有组织好销售工作。比如肇源县羊卖不出去，发展了一批屠宰专业户，不就销掉了不少吗？减少某些环节，做好销售工作，有些看似滞销的产品，在当地市场上也可打开销路。搞活市场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从发展商品生产的高度认识它、支持它，不能用旧框框去限制它、束缚它，更不能打击它。当然也要加强管理，对危害社会、危害群众生活的不法行为，要加以限制和制裁。

多只。现在城镇居民不仅经常可以买到新鲜羊肉，而且售价也不断下降。

其次，发动城乡数百家公司、集体、个体饭店直接到专业户手中购买活羊，或和屠宰专业户签订长期供肉合同。城内一家因亏损停业20个月的“同春园”饭店，两个月前改为专门经营羊肉膳食，顾客盈门，日日盈利。全县仅饭店购买的羊肉就占全县羊肉销量的10%左右。

第三，组织加工企业和收购

部门大力收购。县罐头厂和农村供销社、食品收购站，就近收购屠宰、加工了上万只“白条羊”，运销到省内外大中城市。县有关部门还帮助外贸收购站扩建了一座冷库。

这个县还支持羊肉产地与大中城市“挂钩”联营。活羊滞销问题较大的浩德公社同哈尔滨制氧机等单位联营后，在公社食堂设立屠宰点。新年期间各公社推销的羊已超过1万只。

周晓冰

王恩茂要求新疆农牧区认真落实中央精神

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3日电（记者柴怀吉、杨生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在最近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上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适合新疆农牧区，也适合国营农牧场，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农牧民群众和农牧场职工的积极性。他要求新疆各地区根据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的精神，进一步稳定和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王恩茂的讲话，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认为自治区领导人全面肯定和强调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对在全疆进一步稳定和不断完善生产责任制，促进农牧业大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历来比较贫困的南疆5个地区和州，从1980年起实行家庭大包干责任制，到1982年就收到显著成效，整个南疆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了10亿斤左右，每人平均收入从66元起实行家庭大包干责任制，到1982年达到110多元。1983年，这个地区每人平均收入又上升到137元。广大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蒙古等少数民族群众普遍称赞这种责任制好。北疆地区土地面积大，水土条件比较好，机械化程度较

高，各族农民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强烈要求，但由于一些干部有种种疑虑，迟迟没有推开。据自治区有关部门统计，新疆主要产粮区的北疆，1982年5个地区、州、市中有4个粮食产量徘徊在1979年的水平。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出后，北疆农牧区才广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年底，北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发展到82.9%，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出后，又上升到95.9%。同时，家庭联产承包制还向牧业、林业、副业等方面扩展。

1983年，新疆农业虽然遇到多种自然灾害，但

南北疆都获得全面丰收，粮食总产量突破了90亿斤，比1982年增长11.3%，每人平均收入增加了30元。目前新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97.6%，畜牧业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在广大牧区迅速推广，达到60%以上，北疆的伊犁牧区已达80%以上，阿勒泰牧区去年下半年也开始在各县试点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反映效果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王恩茂在讲话中强调，各级干部要解决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使之更加完善。同时他还主张牧区推广畜群承包到户责任制，认为这种形式能较好地克服平均主义，调动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利于放牧管理、合理利用草场、牲畜品种改良和疫病的防治。

季节性畜牧业

本报讯 记者段心强报道：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和北京市房山县豆店大队试搞季节性畜牧业，从内蒙古等地买回牧区繁殖的牛、羊，在农区育肥，促进了畜牧业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生产，显著地提高了经济效益。

牧区四季饲料不均，牲畜“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农区秋收后，有大量秸秆、饼粕等饲料白烧掉或直接下地当肥料。党的政策放宽后，大厂县农民在冬春两季，从内蒙古和河北张家口、承德等地的牧区、半牧区买来瘦弱的牛、羊，经两个多月育肥，投放市场。1983年，全县共有肥出售11,290多头牛。北京市的豆店大队从1980年开始，在市农林科学院综合研究所帮助下，从内蒙古开鲁县引进“梁子牛”，利用农区的秸秆、玉米、大麦、豆饼，三个月育肥后，供给

大厂县和豆店大队的实践证明：牧区“冬育肥”和农区挂钩，对牧区繁殖仔畜，农区育肥，搞季节性畜牧业，对牧区能够减轻冬春草场的压力，避免冬春掉膘和死亡。对于农区，能够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农业发展。总之，发展了畜牧业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商品率，有利于加工和销售。

季节性畜牧业

季节性畜牧业是根据一年四季的变化，夏秋利用草原水草丰盛的优势，生产肥羔和越冬牛等牲畜，冬春牲畜越冬，减少草场的压力。

“季节性畜牧业”的做法在历史上就有。据调查，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的夏垫镇，二百多年前就已成为长城内外的牛羊集散中心。每年秋冬冬初，有大批商人从内蒙各口赶来一群群牛羊，在这里出售；从内地各省来人把牛羊买来，有的使役，有的就是专门冬春育肥。

国外有类似做法，但与我国的季节性畜牧业还不相同。美国从三十年代起，在中西部玉米种植区以及五大湖地区，兴起一种“畜牛肥业”，以后在得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扩大经营，到了六十年代便在整个美国盛行起来。最近几年，畜牛肥业趋向大型化、企业化，1975年全国经营畜牛肥业的有14万多家，肥牛头数达二千多万头，占美国畜牛屠宰数的50%。其饲养方法是：对畜牛重量、性别、品种等进行一系列科学研究，制定饲养标准，由电子计算机控制，自动配料，按时喂养，育肥期为120天，每头畜牛一般增重390磅左右。



小资料

丹东市改革干部管理制度

企业既管生产又管干部

本报讯 中共丹东市委最近决定改革干部管理制度，使企业既有权管生产，又有任免权。

近几年来，丹东市委和政府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步子比较大，取得一定成效。在改革中，他们遇到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的干部管理制度和生产管理脱节，企业管生

产却管不了领导生产的干部。这个问题直接影响改革的进行。丹东市委和政府总结了经验，决定公司所属县、处级、科级单位正副职干部一律由所属局或公司任免。同时还提出，干部任免权限调整后，主管干部的部门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选拔领导干部、配备领导班子的

各项要求，严格执行省、市委关于领导班子的人数、年龄、文化、专业结构等各项规定，建设好领导班子。对企业主管部门违背党的原则造成任免不当、调动不妥等问题，市委组织部有权检查监督，加以纠正。为了加强干部交流，经市委同意，可以在全市范围内选拔人

才，派到县级企事业单位任职。同时还提出干部任免权限调整后，新任任县级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因不胜任而不再担任领导职务时，不保留县级待遇。

马庚令 秦友顺

石店煤矿管理干部改月薪为日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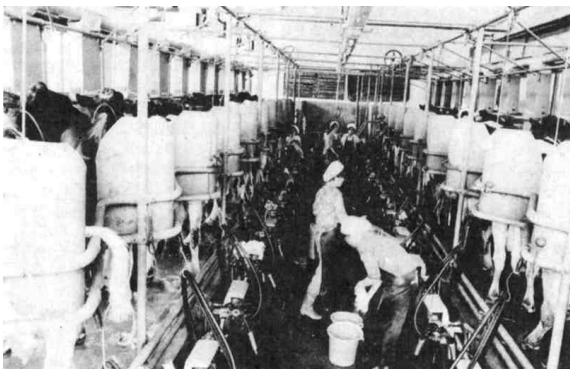
病事假减少46%，出勤率提高11%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1981年以来，山西省孟县石店煤矿的管理干部，由原来的月工资，改为联责计酬的日工资，搬掉了“安乐椅”，甩掉了“铁饭碗”，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这个矿在搞经济责任制的时候，对工人按完成任务好坏，实行浮动工资；

对管理干部依然实行月薪制，上班不上班、干好干坏都一样照拿工资。有的干部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上岗，月薪一分也不少拿。群众对这很有意见，管它叫“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矿党总支研究了工人的意见，认为提得有理，于是决定：上至书记、矿长，下至科室干部，一律实行日工资制，上大班发一天工资，病、事假同工人一样进行减扣，无故缺勤和工人一样受罚。同时制订干部联责、联奖、联罚的奖惩制度，凡出勤不足28天者，不得享受当月奖金；发放奖金拉开档次，按工作效率进行考核评比。这样改革以后，积极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无故缺勤、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现象基本消除。据统计，管理干部的病、事假比过去减少了46%，出勤率比过去提高了11%。

深圳市光明华侨畜牧场从瑞典引进两套鱼骨式挤奶器。挤奶时奶牛感到舒适，比人工挤奶提高工作效率近50倍。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深圳农业的步伐

《深圳特区报》记者 陈桂雄

深圳市农村的工农业总产值，去年已从1979年的1.75亿元跃到8.7亿元，增长了397%。这一事实说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可以大大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后，市委及时地把农民在实行责任制后焕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引导到发展商品生产上来，大刀阔斧地改革农业生产结构，从宝安县拿出7万多亩土地，种植蔬菜、水果、花卉，挖塘养鱼。接着，进一步放宽政策，大力扶持重点户、专业户发展商品生产。去年全市各类专业户已达7,300多户。同时，开放了边境小额贸易，积极引进外资、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良种，发展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以及来料加工业，加强与内地农业高等院校、科研和生产部门的联系，建立农、林、牧、副、渔业科研、生产基地。放宽政策，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深圳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的转化，并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深圳毗邻香港，在出口鲜活农产品方面，具有销售渠道多、运输距离短、上市快、鲜活率高等特点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年来，全市着重发展了养鸡业、淡水养殖业、畜牧业和蔬菜、水果种植业。五年共引进种植和养殖项目421宗，客商投资额达三亿二千万零九万港元。去年，全市有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养鸡场194个，专业户或经济联合体兴办的养鸡场130个，上市活鸡450万只，其中出口343万只，全市蔬菜种植面积66,048亩，上市61.2万担，出口38.8万担；全市鱼塘面积42,900多亩，出口塘鱼34,800担。新兴的花卉种植业，有5个盆景场，鲜花种植面积1,200亩，去年仅出口剑兰就达1,200万支。去年和1979年相比，活鸡出口量增长22.84倍，水产品出口量增长250.3%，蔬菜出口量增长304.57%，水果出口量增长172.74%。全市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已达57.8%。有7.9万多人从事农业商品生产，占农村劳动力的79.5%。

深圳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是和市场信息、资金信贷、科学技术、交通运输等方面提供的服务分不开的。养鸡业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例子。深圳的养鸡业最初是通过引进客商的资金、技术发展起来的。但在发展中遇到了两大障碍，一是70%的鸡苗因防疫问题，国家每年要支出外汇1,200万港元，而且购进鸡苗成本高，增加了生产者的负担。二是从香港引进的育雏舍不适合这里冬天的气候特点，鸡雏死亡率很高。为此，1980年4月，华南农学院和广东省家禽研究所专门派人到深圳推广地下坑道式温床雏鸡舍和电孵箱不加温孵化法，降低了成本，减少了鸡雏死亡。市行去年发放贷款645万元，建立7个种鸡场，年产鸡苗450万只，使全市鸡苗自给率接近七成。目前，深圳养鸡业提供市场信息、科技服务的专业性机构有七个；出口活鸡被除掉了过去的繁琐手续，由客商直接派车到鸡场提货。深圳的鸡苗产量在1983年发展到650万只。

深圳农业发展的另一特点，就是形成了以

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收入已经赶上和超过了农业收入，农村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去年深圳农村工业总产值7.2亿元，农业总产值1.5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2.76%。全市271个乡，70%以上兴办了来料加工业。目前，深圳农村正在执行的“三来一补”协议，共1,654个（不包括农业项目），深圳农村生产的各种来料加工产品，远销世界五大洲。其中许多产品，如吹风机、电饭锅、手袋、电子表、轻便皮鞋、塑料丝花等在海内外都有一定的声誉。

现在，深圳农业已经形成了一些技术先进、管理科学、产品竞争力强的生产项目，逐渐成为吸收国内先进农业技术的窗口，成为向内地推广广东先进农业技术和传递农业科技信息的桥梁。目前在深圳投资兴办农、林、牧、渔业的，有美、日、泰、菲等国及香港地区的客商，还有来自中央和各省的农业科技、生产部门、农业高等院校、中央和广东省的有关部门还与深圳联合办规模宏大的综合性的深圳农业科研中心，占地面积一万多亩，首期投资600多万元。这些都为深圳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一些生产领域，已形成某些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项目，具有国际和国内先进水平。例如香港中国资源有限公司在深圳开办的高密度养鸡场，采用了国外的先进技术，每英亩年产沙鸡20吨（年收32吨），网箱养鱼技术；无土栽培技术，吊养鳗，网箱养鱼技术，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国家水产总局、广东省水产局和深圳市联合投资建设设的沙头角虾苗场，在工厂化设施里培育出来的新对虾、中国对虾、墨吉对虾、斑节对虾，粗壮，个体大，成活率高，运输方便，价格便宜。在深圳投资兴办养虾业的港、台、香港客商，过去都从台湾、香港、湛江等地购苗，从去年开始，已全部改从沙头角虾苗场进货。和上年相比，虾苗场虾苗产量增加三倍，利润增加一倍。

深圳农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1978年全市农村人均收入仅134元，去年已达469元，并且涌现了2,400多万元户，发展最快的罗湖区农村人均收入达1,226元。其中，闻名全国的渔民村，人均达2,800多元。

深圳的农业，象深圳的其他事业一样，目前正以很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铁牛”入“保”

2月26日，江西上高县锦江公社白沙湾村一片欢腾。运输专业户黄兼宋驾驶着一辆修复一新的拖拉机又“出征”了。这时，人们放起一串鞭炮，庆祝“铁牛”入“保”的好处。

黄兼宋从1982年开始，和另外两个社员承包了大队的沙石副业。

他向银行和亲友借贷，凑足1.6万多元，买了一台拖拉机。去年年底，拖拉机进行检验时，监理站和保险公司的干部动员他参加机动车辆保险。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交了两个月65元的保险费。

一次，黄兼宋请拖拉机驾驶员黄新明驾着拖拉机去林场拉石头，在路上出了事故，拖拉机机件严重损坏。黄兼宋很遗憾。这时，保险公司上高县农业银行代理处派来了干部，诚恳地对他：“你的拖拉机投保了，损失由我们核赔照章补偿。”今年元月12日，保险公司给黄兼宋汇来了10,276元。黄兼宋接到通知单，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拿了款子赶到上海，修好了拖拉机，决心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大干一番。

农梅儿 何向明

南昌科技研究所试行科研经济责任制

不要国家事业费，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不宜宜搞科研的主动要求调离

本报讯 《光明日报》记者王绍雄、本报记者赵相如报道：江西省南昌市科学技术研究所最近推行科研经济责任制，促进了科技人员的合理流动。一批学有专长的毛遂自荐，要求调入该所；该所一些不宜宜搞科研工作的人员，则要求调离。

南昌市科研所是一个以应用技术为主的科研机构，在编科研人员、行政人员等共163

人，其中因基础知识较差、长期出不了科研成果的人员占全所的三分之一。由于他们占丁编制，使学有专长、能搞科研的人调不进来。去年以来，该所能研室实行科研经济责任制，不要国家事业费，全部开支（包括工资、差旅费、劳保费用、图书资料等）由该室从承包课题的研制费、技术转让费以及技术服务费中解决，权、责、利全部落实到

责任制。由于实行了科研经济责任制，不宜宜搞科研的人员不能被课题组选用，只能等待另行分配工作，或是先去“打架”。这些待分配的或“打架”的人员，由于无法继续呆下去，主动要求调离。

目前，已有7名不宜宜搞科研的人调走，还有14名正在办调离手续。另有十多名学有专长的科技人员要求调入该所。

真是罪过：白鳍豚竟被论斤卖肉

安徽省政府正在严肃处理
安徽白鳍豚在安庆铜陵江段被捕获杀

本报讯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长江安庆、铜陵江段的一些渔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捕杀了四头白鳍豚，引起人们的震惊。

白鳍豚和大熊猫一样，是只产于中国珍稀兽类，地理分布狭窄，数量非常稀少，现在仅留存一百多头，濒于绝种，已被列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2月25日，安庆市郊区罗塘公社联心大队渔民钱满，在安庆江段牛头山附近用滚钩捕杀了一头161斤重的雄性白鳍豚，经贩卖人于手被安庆市水产公司批发门市部以每斤二角钱的价格违章收购。

安徽省副省长侯万、孟富林闻讯后，立即批示严肃处理，并以省政府名义派出调查组奔赴现场。当这一事件调查清楚还没有作出处理时，渔民唐礼章、汪云

龙等人又于3月19日至21日，连续三天在安庆、铜陵江段用禁用渔具簰箔和鱼叉杀死三头（两雌一雄）大白鳍豚。副省长、教授杨纪珂听到连续捕杀四头白鳍豚大为震惊，非常愤怒。他亲自撰文告发安庆、铜陵等沿江市县，要求采取坚决措施制止捕杀白鳍豚。

3月23日安徽省政府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对四起捕杀白鳍豚事件作详细调查，并根据情节轻重，给肇事者以应有的惩处。会上还就进一步加强白鳍豚等珍稀动物的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

四头珍贵的白鳍豚相继在滚钩和鱼叉下丧生，实在可惜，也令人气愤。对于严格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国务院早有通令。刑法第130条也明文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珍贵、珍稀或者其他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对于那些采用野蛮行为捕杀珍贵动物的有关人员，必须彻底追查，依法依办。否则，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就是一句空话。

——编者

联邦德国驻华使馆为抢救大熊猫捐款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馆今天为抢救大熊猫提供了捐款。

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修德在大使馆把款项交给了林业部副部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董智勇。

修德大使说，联邦德国驻华使馆全体人员十分

关心中国抢救大熊猫的活动，全馆40多人每人捐款，以表达他们的爱心。

山东嘉祥县发现23块汉画像石

最近，山东省嘉祥县纸坊公社敬老院在整理院落时，从土中挖出23块精美的汉画像石。

据专家鉴定，这些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社会生活为题材的画像系东汉早期或中期的作品。现已将这些石刻收藏在这个县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氏祠中。

（据新华社）

为便民利民 公安干警更应爱民 上海公安局改善警民关系 挣钱收钱用钱 人才培养会得花钱 江苏南通县筹建电视大学

《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市公安局抓住交通管理和户口管理等影响警民关系的问题，制订为民、便民、利民规定

《新华日报》△江苏省南通县从乡镇企业上交的资金中挤出专款，筹建一所能容纳千名学员的电视大学

《山西日报》△阳泉矿务局团委为后进青年和失足青少年设立进步奖

《经济参考》△中国科学院五位专家建议充分开发15年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把它建成高技术密集区

《湖北日报》△运销大户万连军在土豆滞销时向省领导机关求援，省委、省、省经委热情帮助联系，为积压的30万斤土豆找到销路

《四川日报》△仪陇县柳江畜牧兽医防治站方衡级合同，造成养鸡专业户经济损失，受到经济制裁

《河北日报》△唐山市肠衣厂实行连续经济责任制，1983年实现利润38万多元，相当于该厂15年利润的总和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15小时的抢救，一名乌鲁木齐33次的回族妇女脱险

《经济日报》△于明涛审计长指出，要以整党为动力扭扭扭扭扭扭，把社会舆论同审计监督结合起来

《大众日报》△山东省潍坊市二十里堡公社的干部在机构改革不知工作去向情况下，不等不靠，积极抓好当前工作情况

《南方日报》△广东省农业厅查清厅、处、科三级干部多占住房，共清退住房314平方米，加收房租面积82平方米

《中华日报》△新民县委为“二道贩

子”正名以后，全县“万人马帮”跨进运销领域，形成一个联结城乡的运销服务网

《中国煤炭报》△上海电表厂研制成功新型瓦斯测量报警仪

《陕西日报》△合阳县发生一起村队干部勒索并机榨专业户房屋的严重事件，省委书记赵维权要求认真查处

《贵州日报》△遵义市一批“能人”牵头大规模开发荒山，今年头3个月就通现万亩以上的承包户14个

《吉林日报》△省冶金工业总公司无视整党决定，以权谋私，3月份私分截留奖金计黄金单位和个人名牌自行车506辆，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福建日报》△今年福州市计划供应的150万只鸡鸭全部实行产销一条龙，由农业部门组织自销、凭票平价供应给市民

《湖南日报》△郴州市大力发展农村建筑业，全县城市建筑业人员达15,000多

《天津日报》△天津市民政局决定今年为孤老残人办8件事，其中包括兴办“益寿园”、寄养残疾人活动中心等

《北京日报》△陈希同市长在北京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宣布，从今年起允许外商来京独资办厂

《工人日报》△金总发出关于纪念“五一”劳动节活动的通知

《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金命顺4月2日收到了南朝鲜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郑周永对他3月30日去信的复信。

金命顺在给郑周永的信中建议朝鲜南北双方组成统一代表团参加今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和以后的主要国际体育比赛。

郑周永的信是昨天由汉城方面的两名联络员在板门店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会议室面交和国方面联络员的。

据日本共同社自汉城报道，郑周永在复信中表示接受北方关于组成统一代表团的建议，并同意就此在板门店举行双方会谈。

本报北京4月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中国足球队与澳大利亚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中国队以66：72失利。

中国队上半场场上的有8号郎康、13号张惠、14号柳青、15号张月平、16号巴燕。

这场比赛中国队主要是锻炼新秀。

中国队上半场场上的有8号郎康、13号张惠、14号柳青、15号张月平、16号巴燕。

这场比赛中国队主要是锻炼新秀。

课题组及科技人员。贵任制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该室经济收入去年达到8.1万元，做到自给有余。今年，自动化研究室和新产品研究室也实行了责任制。由于实行了科研经济责任制，不宜宜搞科研的人员不能被课题组选用，只能等待另行分配工作，或是先去“打架”。这些待分配的或“打架”的人员，由于无法继续呆下去，主动要求调离。

目前，已有7名不宜宜搞科研的人调走，还有14名正在办调离手续。另有十多名学有专长的科技人员要求调入该所。



白鹤在哪里越冬？它们究竟有多少？

我专家经观察研究揭开谜底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的鸟类专家说，他们经过几年的观察研究，认定我国的鄱阳湖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越冬地，查实我国目前有白鹤737只。

大型珍贵涉禽白鹤，1978年被世界野生动物学家公认为濒于灭绝的物种，收录在象征濒危的“红皮书”中。

白鹤在西伯利亚北部繁殖。长期以来，人们对白鹤究竟在哪里越冬的问题一直没有弄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鹤类课题组，费时三年，于1980年冬，在鄱阳湖西侧的沼泽中，首先发现白鹤越冬群。接着，他们又进行了连续观察研究，获得大量生

湖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各项措施的落实，将有助于白鹤摆脱危境，和人类永远相处在一起。 丁宁

资料。

通过连续三年的地面及航空调查，可以肯定：鄱阳湖西侧的沼泽是世界上白鹤的最主要越冬地；在我国越冬的白鹤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体。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1981年为140多只，1984年1月为737只。

1983年2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鹤类专家从在印度开得的鹤类学术讨论会上得知，1983年印度有36只，伊朗有5只越冬白鹤。如今，这个数字若无变化，那么现在世界上的白鹤总数应当是778只。我国科研工作者的考察资料表明，倘若没有其它因素干扰，预测明年白鹤的数量仍将保持缓慢上升的趋势。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听取科学家的建议，在白鹤越冬的鄱阳

湖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各项措施的落实，将有助于白鹤摆脱危境，和人类永远相处在一起。 丁宁

资料。

通过连续三年的地面及航空调查，可以肯定：鄱阳湖西侧的沼泽是世界上白鹤的最主要越冬地；在我国越冬的白鹤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体。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1981年为140多只，1984年1月为737只。

大型珍贵涉禽白鹤，1978年被世界野生动物学家公认为濒于灭绝的物种，收录在象征濒危的“红皮书”中。

白鹤在西伯利亚北部繁殖。长期以来，人们对白鹤究竟在哪里越冬的问题一直没有弄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鹤类课题组，费时三年，于1980年冬，在鄱阳湖西侧的沼泽中，首先发现白鹤越冬群。接着，他们又进行了连续观察研究，获得大量生

活资料。通过连续三年的地面及航空调查，可以肯定：鄱阳湖西侧的沼泽是世界上白鹤的最主要越冬地；在我国越冬的白鹤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体。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1981年为140多只，1984年1月为737只。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鹤类专家从在印度开得的鹤类学术讨论会上得知，1983年印度有36只，伊朗有5只越冬白鹤。如今，这个数字若无变化，那么现在世界上的白鹤总数应当是778只。我国科研工作者的考察资料表明，倘若没有其它因素干扰，预测明年白鹤的数量仍将保持缓慢上升的趋势。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听取科学家的建议，在白鹤越冬的鄱阳

湖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各项措施的落实，将有助于白鹤摆脱危境，和人类永远相处在一起。 丁宁

资料。

通过连续三年的地面及航空调查，可以肯定：鄱阳湖西侧的沼泽是世界上白鹤的最主要越冬地；在我国越冬的白鹤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体。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1981年为140多只，1984年1月为737只。

大型珍贵涉禽白鹤，1978年被世界野生动物学家公认为濒于灭绝的物种，收录在象征濒危的“红皮书”中。

白鹤在西伯利亚北部繁殖。长期以来，人们对白鹤究竟在哪里越冬的问题一直没有弄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鹤类课题组，费时三年，于1980年冬，在鄱阳湖西侧的沼泽中，首先发现白鹤越冬群。接着，他们又进行了连续观察研究，获得大量生

活资料。通过连续三年的地面及航空调查，可以肯定：鄱阳湖西侧的沼泽是世界上白鹤的最主要越冬地；在我国越冬的白鹤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体。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1981年为140多只，1984年1月为737只。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鹤类专家从在印度开得的鹤类学术讨论会上得知，1983年印度有36只，伊朗有5只越冬白鹤。如今，这个数字若无变化，那么现在世界上的白鹤总数应当是778只。我国科研工作者的考察资料表明，倘若没有其它因素干扰，预测明年白鹤的数量仍将保持缓慢上升的趋势。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听取科学家的建议，在白鹤越冬的鄱阳

湖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各项措施的落实，将有助于白鹤摆脱危境，和人类永远相处在一起。 丁宁

资料。

通过连续三年的地面及航空调查，可以肯定：鄱阳湖西侧的沼泽是世界上白鹤的最主要越冬地；在我国越冬的白鹤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体。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1981年为140多只，1984年1月为737只。

大型珍贵涉禽白鹤，1978年被世界野生动物学家公认为濒于灭绝的物种，收录在象征濒危的“红皮书”中。

白鹤在西伯利亚北部繁殖。长期以来，人们对白鹤究竟在哪里越冬的问题一直没有弄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鹤类课题组，费时三年，于1980年冬，在鄱阳湖西侧的沼泽中，首先发现白鹤越冬群。接着，他们又进行了连续观察研究，获得大量生

活资料。通过连续三年的地面及航空调查，可以肯定：鄱阳湖西侧的沼泽是世界上白鹤的最主要越冬地；在我国越冬的白鹤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体。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1981年为140多只，1984年1月为737只。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鹤类专家从在印度开得的鹤类学术讨论会上得知，1983年印度有36只，伊朗有5只越冬白鹤。如今，这个数字若无变化，那么现在世界上的白鹤总数应当是778只。我国科研工作者的考察资料表明，倘若没有其它因素干扰，预测明年白鹤的数量仍将保持缓慢上升的趋势。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听取科学家的建议，在白鹤越冬的鄱阳

湖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各项措施的落实，将有助于白鹤摆脱危境，和人类永远相处在一起。 丁宁

资料。

通过连续三年的地面及航空调查，可以肯定：鄱阳湖西侧的沼泽是世界上白鹤的最主要越冬地；在我国越冬的白鹤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体。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1981年为140多只，1984年1月为737只。

大型珍贵涉禽白鹤，1978年被世界野生动物学家公认为濒于灭绝的物种，收录在象征濒危的“红皮书”中。

黑龙江省委采取措施 加速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新华社哈尔滨4月3日电（记者康作中）中共黑龙江省委采取措施，加速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最近，黑龙江省委检查了近年来全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认为这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抓得不紧时，发展不够平衡。

有的领导干部“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对知识分子仍然是看缺点多，看优点少；挑毛病多，支持少；空议论多，解决问题少。有的地区和单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不够合理。

省委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一、对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医院、文化部门等知识分子比较集中单位的领导班子情况进行考察。对于这些单位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中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律加以调整。对人事组织部门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力甚至有抵触情绪的干部，要坚决调开，选调适合的干部充实。

二、加速知识分子的合作、协调、调整、分配和分布，逐步解决人才此多彼少的问题。合理流动的原则上

是：由大城市流向中小城市，由中小城市流向农村，由内地流向边远地区，由重工业系统流向轻纺工业系统，由全民所有制单位流向集体所有制单位，由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单位向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的单位。对那些技术力量相对过剩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大型企业，要实行定编定员，逐步把富余的人员调整出来，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地还可采取招聘、定期支援、内部调整和建立人才交流服务处等办法促进知识分子的合理流动。

三、不断提高知识分子的专业技术水平。要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和趋势，结合本省现在的科学技术现状，确定各学科、各行业知识更新的目标和课题。要为广大科技人员学习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和了解国内外新的科技信息提供条件，使他们能不断更新知识。

四、逐步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对边境和边远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要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

五、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要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对具备了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要及时地吸收入党，逐步改变党员队伍结构。要根据知识分子职称，分别规定出他们阅读文件的范围。

六、广泛宣传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迹，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

为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黑龙江省委定于5月下旬召开全省知识分子工作会议。

联合应用化学与化学工程研究所在京成立

本报讯 4月2日上午，由中国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和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三方联合的“联合应用化学与化学工程研究所”在北京宣告成立。

作为生产企业、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联合的新形式，这个研究所每年将以60—70%的力量承担石油化学总公司的科研任务，研究成果由总公司和承担单位共享。三方协商成立管理委员会，负责审定联合研究所的重大决策、发展方向。

殷虹

人大函授学院开办部队班

本报讯 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开设马列主义理论专业班。

这期函授班学制为三年，以自学为主，每周由人大函授学院派教师面授4至8小时。这是驻京部队中的第一个函授班。

北京着手筹建针灸学院

本报讯 教育部、国家计委和卫生部批准，由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负责在北京筹建一所针灸学院。目前，已组成筹建机构，着手工作。

筹建中的北京针灸学院，学制五年，将设置针灸、骨伤科两个专业，培养从事针灸、骨伤科的临床医疗、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高级人才。学院还将附设一所综合性医院，设病床500张，承担北京市居民的医疗任务。

北京外语学院祝贺李欧丽阁来华任教六十周年

北京外语学院3月31日举行酒会，祝贺李欧丽阁教授来华任教60周年和83岁寿辰。

李欧丽阁原籍瑞士，1924年来到中国，1954年加入了中国籍。她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外语人才。

停刊四十七年的《船山学报》复刊

专门研究王船山思想的学术刊物《船山学报》停刊47年后于3月30日在长沙复刊，向国内外发行。

王船山即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精神。复刊后的《船山学报》将全面地、科学地研究王船山的生平、著述和思想，力求做到古为今用。

（据新华社）

中外风筝爱好者共谈风筝

盛赞中国人民的智慧

新华社济南4月3日电（记者刘德玉）昨天下午，澳大利亚悉尼风筝协会主席、特拉维斯在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举行的中外风筝爱好者座谈会上，把一张面值为20元的澳大利亚纸币赠送给潍坊市风筝协会主席李立，引起了在场近百名中外人士的惊奇。

原来，这张粉红色的纸币上印着澳大利亚科学家亚历山大的头像和八架纵横交错的飞机模型。特拉维斯说：“我赠送的不是货币的纸币，而是用纸币来证明，中国人发明风筝对世界的贡献，也说明我们澳大利亚人曾作出的贡献。”

特拉维斯解释说：“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风筝，这是举世公认的。正因为这样，这次我们6名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澳大利亚人象香客朝圣一样地来了。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体坛教育

不许诬告

《福建日报》三月二十八日社论

好人受气，坏人得势；埋头苦干的人受挑剔，怠工分子常有理。这种怪现象，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本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今天再发生这种现象，就十分反常了。

但是诬告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原因之一，是“三种人”捣乱。你把他拉下马，他是不甘心的，他总要挖空心思，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原因之二，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我干不成，也叫你干不成。这些人脑子里只有个人名利，丝毫没有党和国家观念。

原因虽有不同，但手法基本一致。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不管有理无理，先贴上半份票告你一状再说，逼着你你出调查，搞得你晕头转向。“不能把你打倒，也会把你搞臭。”

张秀峰诬告黄步翔，正是用的这一套手法。

“四人帮”早已打倒了，时代不同了，所以张秀峰被开除出党，撤销职务。

现在的确实还存在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有的人成天不干工作，不动脑筋，不作改革，四面讨好，八面玲珑，小日子过得挺不错；有的人埋头苦干，立志改革，反而得罪于人，遭人非议，经常被“人民来信”说得一无是处，日子挺不好过。由此可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还需要狠下一番功夫。

当然，改革者也有缺点，也需要批评、帮助，即使是尖锐的批评，或个别事实有出入，也是正常的，允许的，是对改革者的真正爱戴。但是，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妒嫉能成，取而代之，那是绝对不可许可的。

我们必须向后一种人大喊一声——

不许诬告！

本报编者附记：去年11月间，正是福建省调整县领导班子的时刻，漳浦县人民政府调研员、原副县长张秀峰，为了向上爬，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冒充漳浦县财政局长温贤明的名字，写信给福建省人民政府一位副省长，指控漳浦县委书记黄步翔有“违反财经制度，调

整班子选奴才不选人才”等十几个重大问题，经查，纯属捏造。

张秀峰诬告行为被揭穿后，受到该县干部和群众的谴责。最近，张秀峰已被开除党籍，被撤销县府调研员职务。《福建日报》在刊登此消息的同时，发表了这篇社论。

首都少先队员瞻仰李大钊烈士墓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记者张宝瑞）今天上午，首都1,200多名少先队员代表，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庄严宣誓。团中央、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李大钊烈士的长子、中顾委委员李葆华和夫人田映宣，书写李大钊烈士碑文的杨章庭，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次活动是北京市少先队员组织举行的“缅怀李大钊爷爷，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活动的一部分。

歌圩盛会

——广西、西南、三月三壮族歌节速写

新华社记者 陆汉魁 本报记者 柏生

阳春3月，邕城绿树成荫，莺飞燕舞，壮族人民迎来了自己的传统歌节——“三月三”。

4月3日，正值农历三月初三，春风和煦，阳光灿烂。晌午，来自广西河池、百色、柳州、南宁地区 and 南宁市700多著名歌手，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有的吹着唢呐，有的跳起民族舞蹈，在锣鼓鞭炮声中，兴高采烈地拥着进入南宁市人民公园，参加自治区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壮族歌节。

壮族人民爱唱山歌，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成百上千壮族青年男女云集一处，相互对歌，倾诉爱情，摆成歌圩。这隆重的歌节现在已成为壮族社交和文化娱乐的传统盛会。

今天，满园摆起了歌台。专程远道而来的日本、美国、港澳地区以及自治区内外的两万多中外游人，满面春风，兴致盎然，象潮水般涌进会场。园里，林丛中，花丛边，草坪上，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到处飞扬着歌声。

望仙坡上，白龙湖畔，自治区和南宁市的党政军领导先后来到歌场，和群众欢度歌节。自治区政协主席覃异之，也成了今天盛会的壮族“歌手”。他和来自右江革命根据地东兰县壮族民歌手唱起开台歌：“三月初三好节日，壮族人民齐欢唱，放声歌颂共产党，歌声盖过红河水。”他们的山歌，唱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热爱共产党的心声。

在山茶花盛开、相思树浓荫掩映的歌圩上，人们争赏黄婉秋，倾听她演唱的朴实纯美的山歌。1961年，她17岁时主演了电影《刘三姐》，轰动于中外观众。度过二十多年的岁月，她经历了曲折的人生道路，但今天的歌声仍声情俱切。她热情亲切地为群众演唱了一曲山歌。“邕城三月百花开，红霞万朵搭歌台，婉秋笑歌一曲，一曲山歌迎客来。一曲山歌迎客来，我祝歌台春常在，歌手茶餐充金碗，永为四化抒情怀。”

歌圩里，对歌声。你听，壮家妹仔黄艳萍、蒙雪凤的歌声：

“登上望仙坡，高声唱赞歌，开花开桂树，吐艳映南国……”歌圩里，精彩的民族艺术、体育节目表演也观众驻足。

明天，邕城南湖公园，还将迎来歌手们在椰林中、游船上的声声对歌。

仰瞻。

瞻仰厅里松柏苍翠，鲜花素雅，从左至右排列着傅作义、朱蕴山、杨明轩、陈叔通、沈钧儒、谭震林、邓子恢、罗荣桓、陈毅、李富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

乌兰夫会见新西兰科技部长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乌兰夫副主席今天上午会见新西兰科技部长伊·约翰。席间时说，中国和新西兰都是太平洋地区国家，在很多方面有共同利益，我们希望同新西兰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

席间一行是应中国国家科委的邀请于昨天到达



（上接第一版）

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变化了的新形势，农村宣传工作应该大大加强，而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于实际，这是以上各项工作没有真正转变与加强起来的根本原因。

高扬同志谈的第二点意见是：在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宣传改革的旗帜不够鲜明，也缺乏应有的战斗性。

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新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渐取代了旧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政领导机构改革了；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实行了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党的干部作风也在转变。在新旧交替的形势下，党的宣传工作应该为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唱赞歌，为新事物的顺利成长破除思想障碍。然而总的看来，不但1979年至1982年上半年，这样的工作做得不够，就是1982年下半年以来，我们也是做得不够。

在经济改革的宣传工作上，《河北日报》比较好，其他文艺文化方面就比较差。

为打开工作新局面创造有利条件
山西省委交流使用地市县主要领导干部

新华社太原4月3日电（记者廖由滨）中共山西省委在调整地、市、县领导班子的过程中，对继续任职的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有计划的交流。据统计，在调整后地、市、县领导成员和县主要领导班子成员中，有60%以上的人交换了任职地点。

实践证明，对地、市、县领导干部实行有计划的交流使用，有以下好处：

——有利于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原汾阳县委书记杨澍在这个县工作了25年，人熟情况熟，工作常常按照老经验、老办法办事。去年他调到孝义县担任县委书记后，改变了凭老经验办事的工作作风，先后下到27个厂矿企业调查研究，制定出整顿企业的办法，使这些企业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变化。据了解，象杨澍这样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干部数量很多，仅这次交流的县委书记一级的干部就有91人，其中85人在一地工作长达10年至30年。

——有利于端正党风，增强党性。原左云县县委常委霍凤歧，在左云工作时，因为熟人多，对纠正不正之风常常感到为难。去年他调到右玉县任县委副书记后，卸掉了“熟人多”的包袱，对不正之风敢抓敢管

中顾委委员到潭柘寺植树

本报讯 记者武培真报道：4月3日上午，中央顾问委员会的29名委员，到西山深处的潭柘寺植树造林。参加植树造林的有伍修权、陈锡联、郭达申、赵毅敏、曹瑛、曾三、平杰三、曾志、吴亮平、张光年、高克林、张平化、张秀山、张邦英、李运昌、赵辛卯、赵武成、夏之栩、彭德清、黄镇、张苏、冯纪新、张令彬、方外、周仁杰、曹里怀、张达志、阎揆要、杜文德。此外，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主任焦若愚和他率领的北京市顾委、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40多人也参加到这一活动中。

生活，五光十色

“兹定于2月18日下班后开展兴趣活动，内容有学习西装、套服量体裁剪，讲授天津风味烹饪，教练书法、绘画技法，诗书讨论：《闪光的生活道路》……”

天津市色织三厂产品斑斓缤纷，生活也这样的五光十色！

厂工会干部老杨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搞了一次全厂性兴趣调查。嗨，五花八门！从读书、养花、烹调到希望学气功、旅游等共37种。这使他们看到，工人的生活世界绝非“老人只知站路边、青年只知逛马路”，他们各自有着各种各样的爱好和追求。工会根据资情况先组织读书、烹饪、裁剪、体育、音乐、理发、书法绘画摄影8个“兴趣小组”。光来学裁剪的就有200多名，过去待业时曾摆过裁缝摊的一位青工当师傅，他讲得头头是道。职工们学会不少本领，在八小时以外增添了种种乐趣。

络车间女工葛建秀擅长演唱，进厂后情绪不高。参加女声表演演唱《我们厂里好事多》，甜润的歌声赢得热烈的掌声，掌声又敲击着去思索：“唱先进，可自己呢……”她变了。

打开心灵的窗户

锣鼓喧天。红、政、工、团干部簇拥着一位戴着大红花姑娘。这是色织三厂给质量标兵马芝草家送喜报。马芝草80多岁的奶奶婆婆也颤巍巍跨出门坎说：“我们家还要支持这媳妇当劳模呢！”街坊邻居说：“这比给100元奖金还够意思！”

在建设精神文明活动中，色织三厂很注意打开人们心灵的窗户。心相和是相通的。当传来张海迪、朱伯儒、引滦英雄的先进事迹时，他们就积极“引进”，同时，他们更注意开发本地的“资源”。

创万米无次布的青年标兵韩红，是个进厂才一年多的徒工，开始只觉得完成工作任务对得起工资就行了。有一天去商

邓颖超看望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4月2日下午在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离开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前，到宾馆去看望他们并为他们送行。

邓颖超同西哈努克和夫人进行了亲切交谈。西哈努克向邓颖超赠送了花篮。在座的外交部顾问韩念龙和夫人王珍。

图为主演《刘三姐》的演员黄婉秋(右二)在“三月三”歌圩上与各族歌手在一起。

何国正摄

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在西安参观

据新华社西安4月3日电 由德舒什夫人率领的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从北京抵达中国的文化古城西安参观访问。晚上，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设宴招待代表团。今天上午代表团离开北京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法国驻中国大使马乐等到机场送行。人大常委会委员章瑞英陪同代表团到西安参观。

姬鹏飞会见毛里求斯青年和体育部长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国务委员姬鹏飞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毛里求斯青年和体育部长迈克尔·格洛弗。

毛里求斯客人是应国家体委的邀请，于3月31日抵达中国进行访问的。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和格洛弗部长就发展两国体育交流和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今天上午，李梦华主任和格洛弗部长签署了中毛和毛里求斯1984年和1985年体育交流与合作议定书。

适应形势变化大力加强农村宣传

在宣传新人新事、鞭挞坏人坏事、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和争取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等工作方面，与上述经济改革宣传的情况相类似。

与各种愚昧落后现象作斗争，宣传移风易俗，我们的工作很不得力。

用新的方式、通过新的途径开发智力，我们着手迟了。

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力量小而弱，闭门读书的倾向基本没有改变。

总之，在宣传工作的不少方面，缺乏破旧立新的思想；有的是改革方针任务明确了，但战斗精神不足，以致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文艺刊物及战斗书团的整顿就是如此。

在十年动乱之后，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缺乏明确坚毅的改革精神，工作进展缓慢，当然就毫不奇怪了。

高扬同志谈的第三点意见是：省委宣传部既是省委意识形态工作的参谋部，又是执行战斗任务的战斗队。然而近两年来，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执行得不够好。

他说，执行参谋部的任务，应该掌握全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级干部队伍的思想动态，掌握中央有关宣传工作的新方针、新政策，掌握兄弟省市以及国外与宣传工作有关的新情况、新经验，据以拟定宣传战线各方面工作的计划、方案和措施，提请省委讨论决定。检查起来，宣传部在提供上述情报信息方面是很不灵敏的。

宣传部又是党务行政部门。它要组织省委对宣传战线决策的执行，或者推动政府文教部门和群众团体去执行，因此它又是战斗队。检查起来，宣传部各战单执行（处、室）有些战斗性不强，甚至是很严重不足；部内的战斗分工也不利于集中使用力量。

高扬同志最后说，为了适应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我希望经过整党，能够克服上述三个方面的缺点。

在县委的领导下，他发动群众狠刹了县直属机关党员干部非法建私房、多占住房、拖欠公款、贪占集体财物等歪风，受到干部群众的称赞。

——有利于清除宗派残余。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派性影响，一些领导班子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实行干部制度的交流，有利于铲平山头，克服派性和宗派残余的影响，增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之间的团结。

——有利于干部自身革命化的建设。调整后的临汾地委书记杜志安在思想、作风上严于律己，坚持在办公室居住，同大伙一起到大食堂去吃饭，还利用到基层调查研究的机会为干部讲授农业技术课。不少县委书记上任后，公开向干部群众表明自己不搞以权谋私的事，办事不徇私情、不接受财礼，要求大家对他们进行监督。

春——天津色织三厂精神文明建设见闻

本报记者 肖 薇

现在，这个厂最新的活动是争作文明职工竞赛。人们求进步已不仅看政治表现和生产成绩，而且还要品评文明礼貌，发扬雷锋精神。准备年会的王敏不仅是公司操作冠军，而且领着学雷锋小组长期给一户退休孤老送煤、洗衣、搞卫生，春节聚到老人家包饺子、演节目，老人高兴得哭：“结婚，也没这么讲究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别人都在进步，我干点什么呢？”50来岁的女工张宝贵发现：班组里有一对夫妻17年不和，曾四次闹离婚，工会、行政负责人劝过多次，都未能了结。张宝贵想，自己搞钱买点心拉着对方给婆婆去祝寿，男方被感动也给岳母送礼，一来二去，大家气消了，重归于好。一个普通女工竟解决了多少干部束手无策的难题。

精神文明建设的波浪，象滚雪球一样生生不已。去年底在评选文明职工时，全厂1,000多人当选，争取入党人数从170人增加到270多人。

庆祝匈牙利解放三十九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酒会，庆祝匈牙利解放三十九周年。

应邀出席酒会的有匈牙利驻中国大使伊万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和伊万夫妇在酒会上讲了话，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一辈子做好事

二 缅怀吴玉章同志

杨尚昆

一贯的有益于革命

吴玉章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以至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对祖国对人民有突出的功劳和卓越的贡献。他毕生的一生光辉榜样，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师表。

毛泽东同志在吴玉章同志60寿辰的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吴老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革命，是我们党的光荣、革命的光荣！我有幸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他的亲切教导。几十年来，他的身传言教，他的崇高形象，我目染耳濡，深深印在脑海里。他热爱人民，热爱青年，广大人民和青年将永远纪念他。

吴老从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进而转变成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是我国许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吴老是革命的先驱者，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历史学家和中国文字改革的倡导者。

吴老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位深切关心祖国兴亡的爱国主义者。吴老少年时代在四川自贡市读书时，出于强烈的爱国心，曾热烈拥护和宣传康、梁维新变法运动，被称为“时事大家”。吴老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革命骨干之一。在日本留学时，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选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的评议员。他奋不顾身地参与了讨伐两江总督张之洞，参加珠江口水师提督李准和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涛的活动，并策划和参与了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

起义失败后，他潜回四川，参与领导了四川人民保路同志会的斗争。在武昌起义前两个月，他领导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布荣县独立。在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他领导了四川内江起义，成立内江军政府，任行政部长。随后到重庆，参与创建了蜀军政府。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吴老受孙中山邀请，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

南北议和后，他拒绝了袁世凯许诺给他的高官厚禄，1913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倒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他被迫流亡海外。1914年，他进巴黎法政大学学习。同时，他同蔡元培、李石曾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积极倡导和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组织华工教育，争取华工权利，并继续进行反袁斗争。

袁世凯倒台后，吴老于1916年回国，随后参加孙中山组织的护法运动。1918年受孙中山委派，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到广州参加护法军政府的工作，同军政府中的南方地方军阀作不懈的斗争。

1920年底，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的狂妄野心，他同四川组织和领导了四川“自治运动”。

从1922年开始，吴老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22年，吴老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这时，他先后受到王维舟、恽代英的影响，拥护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与杨闇公等二十多人，秘密创建“中国青年共产党”（即Y. C. P.），并创办了《赤心评论》，宣传革命思想。

那时，我在成都高等师范读书。当时高师是四川的高等学府，高师的校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吴老也已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了。但吴老却平易近人，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把高师发展成为一个革命中心。吴老经常到我们家去杨闇公商量工作。那时，他和杨闇公、王右木领导着成都地区的革命活动。我很尊敬他，称他“吴老伯”。他常常很和蔼亲切地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介绍一些革命书刊给我读，并让我为他们传书送信，当一个革命交通员。他是我的老师和革命的启蒙者。

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发动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为此北上。吴老和刘伯承同志也于2月间从四川到了北京，经北京革命书记范世凯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完成了由旧派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争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老入党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四川党组织的一位创建人，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创建人，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一位负责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党中央派他回四川重庆，创建、扩大四川党组织，着手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他在重庆创办中法大学，作为我党的活动基地，又在莲花池建立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这时，杨闇公和我到了重庆，吴老和重庆的党团组织也常在我们家开会，他们让我作会议的记录员，并参加文件的印刷和油印等工作。吴老主持的中法大学，聘请杨闇公、漆涛等（南薰）、萧华清、杨伯凯等同志担任教职员，在师生中发展和培养了一批党团员。在四川我党的创建中，吴老、杨闇公、王右木都是创始人，杨闇公担任了第一任省委书记。吴老以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对

四川党的创建，功绩卓著。

1925年秋，吴老和杨闇公等被选为四川省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1月到广州。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他被选为大会秘书长和中央执行委员，同国民党右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吴老在延安时，曾对我讲起这段往事：国民党二大前夕，*来广州开会的各省代表，稀稀拉拉到的不全，大会没有开成的样子。苏联顾问鲍罗廷同陈独秀商量，决定发挥我党的力量，把大会开起来，以发展国共合作。他们决定派吴老筹办。吴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筹备工作后，依靠各省、市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织积极活动，很快选出了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大会得以胜利召开。这次大会，国民党左派占优势，战胜了西山会议派及戴季陶等右派，国共合作得到加强。

国民党二大后，他回四川。为准备北伐战争，他策动争取了川军两个旅、黔军两个师，后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二军，攻下宜昌。

北伐出兵后，吴老于1926年7月从四川经上海去广州。在上海逗留期间，他经常抽空到我党领导的海大学看望师生们，对正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的我和同志们多所鼓励，并带来闇公的嘱咐。吴老8月到广州，联合何香凝等左派同蒋介石的独裁倾向作斗争。他旋即随军到武汉。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他在国民党中央处于中枢地位，继续领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他先是担任了国民党中央代替孙中山总理的五人行动委员会成员。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中，他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中央党部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吴老执行我党中央意图，使这次会议通过决议，剥夺了蒋介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权。以后，他曾到宜昌为武汉国民政府筹款400万元，并保护贺龙部队开到武汉。他协助朱德、刘伯承同志发动了四川泸顺起义。这次起义是我党较早地自己掌握一批军队的要项会议。他在武汉截获了在重庆制造“三·一”惨案同蒋介石勾结的凶手杨引之，交付革命法院处决。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紧密联合国民党左派，为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动倾向和反动活动，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吴老参加了英雄的“八一”南昌起义，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 international 反法西斯斗争的宣传。

“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吴老奉党中央之命，赴九江，转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薄暮之中，千里转战，极备辛苦。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吴老等出走流沙，驾一叶扁舟，渡浩渺之大海，漂流到香港，辗转到上海找党中央。

到上海后，党中央派吴老到苏联学习。他和林老、徐老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吴老勤奋攻读马列著作，进一步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自己。我那时也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吴老常见面，继续得到他的教益。这时，他开始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同托派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战。

1930年10月，吴老从特别班毕业，与林老等分配到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他开始从事新语法拉丁化新文字的研究，与瞿秋白等同志对创制新文字方案作了重要贡献。

1933年夏，他调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并参加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他在中国部讲授中国历史，编写《中国历史教程》等讲义。在中国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历史科学作出了许多贡献。

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吴老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这期间，他参与起草了“八一宣言”，并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报告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之后，他到巴黎创办中文的《救国时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报纸利用国内《新生》周刊刊户名单和地址，广泛寄到国内，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扩大了党的影响。当时上海和许多地方地下党的同志，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就是通过《救国时报》看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才开始宣传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吴老在重庆、在武汉、在延安，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并在延安、在华北，从事党的培养干部的教育事业，积极从事新文字改革工作。

七·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他与国民政府代表张冲，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在欧洲的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等地，进行抗日反法西斯的国际宣传，使西欧各国支援中国抗战的运动有明显的发展。中国的抗日运动之所以能在国际上取得重大影响和热情支持，是与吴老的积极宣传分不开的。他在欧洲的演讲记，1938年在武汉广为印行，书名是《吴玉章抗战言论集》。

1938年4月，他回到武汉，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先后在武汉、重庆、成都，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年7月，他是国民政府党的我党七名参议员之一。在1938和1939年，他先后在武汉和重庆与董必武同志等一起，同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作斗争，同汪精卫的投降妥协阴谋作斗争。

1938年10月，他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1939年11月，吴老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1940年1月，党中央为他的60寿辰补行盛大的庆祝会，上面讲过毛泽东同志在祝词中称赞他“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指出“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坚持性’”。就在这个时候，我同吴老在延安再次相见，杨闇公等已牺牲，中国革命尽尽艰难，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胜利前进。在延安，我常去吴老住的窑洞里长谈，倍增亲切。

1940年11月，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

在延安期间，他还先后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为党的教育事业尽力，培养了大

忆念稼祥同志

王 震

我和稼祥同志第一次会面，是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我和袁德生同志率湘赣苏区代表团参加大会，被分配住红军苏区政治部。那时，稼祥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大会上被选为军委副主席。这之前，我就听到过稼祥同志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具有马列主义渊博知识和理论素养的有才干领导人，对他很是仰慕。我放下背包，安顿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便去见稼祥同志。

稼祥同志高雅的个子，外表看去，有些严肃。其实，他是个外表严肃而内心温和的人。我们完全不像初次见面，无拘无束，推心置腹地交谈着。他详细询问了我们湘赣苏区的红军发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军民关系以及对红军家属的优待等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接着，稼祥同志又谈到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道理。他说，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敌人的统治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对农村控制则比较薄弱。另外，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而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集中在农村。所以，我国革命不能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稼祥同志的这些议论，实质上针对当时同志中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发的。稼祥同志精于我军的政治工作，他在建立、健全红军政治工作机构，制订政治工作规章制度方面，费了不少心血，有着卓越的建树。我们湘赣苏区当时就着稼祥同志主持的总政治部制订编发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团政治委员须知》、《连政治指导员工作须知》等条例，另外还有战士文化读本、政治读本等教材。这次谈话中，稼祥同志也谈到了如何加强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红军指战员除了学习军事外，还要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只有让红军官兵进一步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就能大大增强红军的战斗力。稼祥同志娓娓而谈，使我获得不少教益。我惊讶他的学识的渊博，折服他的思想的敏捷，敬佩他的见解的深邃。最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鼓励说，你们湘赣红军的成份，主要是粤汉铁路和汉冶萍工人的工、参加过北伐战争的战士以及经历过土地革命的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祝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此后，战事繁忙，我们又不在一起根据地，我们间的直接接触就很少了。在休息时间到长沙湘苏军区，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批干部。

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干了许多坏事。康生在莫斯科担任过王明的英秘。康生为了掩盖自己而恶毒中伤吴老。吴老作为忠厚朴诚，因在莫斯科时曾在王明领导下工作，感到说不清楚，背了黑锅，内心痛苦。在整风中，他还对这件事作过检查。建国后，1958年中国国民党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是康生挑起的，其目的还是为了打击吴老。

1945年4月，吴老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日本投降后，1945年12月，吴老去重庆，与周恩来等同志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会议的南方局的领导工作。以后，又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地区进行战斗，领导川、康、滇、黔人民的解放斗争。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包围了曾家岩中共四川省委驻地 and 红岩村新华日报社，吴老临危不惧，团结全体同志同反动派坚决斗争。他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美国人的罪行，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浩然正气和英勇不屈的崇高气节。他的真正斗争，迫使反动派不得不有所收敛。他终于率中共驻渝全体同志胜利返回延安。

吴老撤回延安后，旋即到山西临汾组织领导了四川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为解放大西南培养了大批干部队伍。

1948年，吴老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1949年3月，参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时，吴老已是70高龄，他还写信给毛主席“请缨杀敌”，要求中央军委允许他带一支队伍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1948年5月，吴老担任了华北大学校长。12月30日，当他70寿辰时，党中央发来贺信，说：“中国人民都敬重你……这是你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华北大学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北平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以后他是历届政协的常委。

政治委员，那时我任湘赣军区代理司令员。任弼时同志对稼祥同志十分熟悉，他常同我谈稼祥同志的很多情况。1934年底，我们红六军团与贺龙同志率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后，我又从熟知稼祥同志的关向应同志以及夏曦、朴朴同志那里知道了稼祥同志的不少情况，从而对稼祥同志的品质、修养、作风、为人等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日加深加，对稼祥同志也更加敬佩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后，稼祥同志去苏联治病，到1938年8月才返回延安。那时，我在抗日前线。1939年9月，我们三五九旅奉命回到陕甘宁边区。这时，我经常到延安向毛泽东主席、王稼祥主席请示汇报工作。这样，我和稼祥同志的接触便又多起来了。

稼祥同志长我两岁，工作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但日常交往上，完全是兄弟般的同志关系。他们然象个兄长，关怀着部属的生活、身体等情况。一次，我到他所住的王家坪汇报工作，当他知道我胃弱有“故障”后，便急忙问我大便是什么颜色？我说黑色。他的夫人、延安边区医院大夫朱仲丽同志查，可能是隐血，并当即给我检查。稼祥同志知道我爱吃辣椒。问我是不是还在吃？我说还在吃。他和朱仲丽同志再三叮嘱我说：“不能再吃了，等胃好了再吃。”他留我在他那里吃晚饭，并拿出他自己吃的烤馒头让我吃，说这象饼干一样，有助胃的消化。他还嘱咐我说：“你回去后也烤一些。”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他问我吃没吃烤馒头？我说没吃。他严肃地说：“你不要不在乎，闹成溃疡，胃出血就危险了。”从馒头片这个小事例可以看出，稼祥同志作为我党我军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对同志的关心、爱护是很周到的。

稼祥同志更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爱护同志。在延安那时期，他多次鼓励我要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安排我们去听王学文、何思敬和理论界其他著名人士讲授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他还对我说，要下工夫多读点书。胡耀邦同志（当时在总政治部主任组织部）就很注意勤奋学习，博览群书，肯下工夫钻研问题。稼祥同志这些嘱咐，使我在学习方面不敢懈怠。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在陕甘宁边区，我们一面整风，一面御敌，开展大生产运动，尽管时间紧张，任务繁重，但也确实读了一些书。当然，这是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下做的，但与稼祥同志的鼓励、督促也是分不开的。

稼祥同志给我的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谦虚谨慎、绝不邀功炫功的高贵品质了。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时期，稼祥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显著。这期间，他参与了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为党中央起草过一些重要文件，写了一些重要论著，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同他的频繁交往中，他从不提起这些贡献，反而常讲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如他常讲自己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教训。关于在革命的危险关头，他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在遵义会议上，毅然决然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决裂，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功绩以及在遵义会议后，他作为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参与全党全军最高领导的情势，他从未给我谈过一句。这些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讲起时，我才得知。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稼祥同志就遭到林彪、江青、康生的诬陷迫害，但毛主席对稼祥同志一直是保护的。林彪叛逃死亡后，稼祥同志被召回京。我便同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商量说，毛主席多次赞扬过稼祥同志，中央应充分肯定稼祥同志的工作。他们十分赞成。接着，我就去看望稼祥同志，并劝他给毛主席写封信，汇报一下思想情况。稼祥同志很快把信写好了，在信中又一次检讨自己是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身不安”。这封信是由我转呈毛主席的。1972年，党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稼祥同志的一生所做的评价。我仅记得大意，其中有：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究，很难得。应该赶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好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支持我的人。王稼祥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我嘛，你嘛（指周恩来同志），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毛主席还批示让稼祥同志参加老中青学习班，请周总理办。稼祥同志自出来工作吧，我一方面为稼祥同志高兴，一方面为稼祥同志不通过炫功的高贵品质而深深感动和由衷敬佩。我先委托廖承志同志，以后也到稼祥同志住的住所同稼祥同志讲了毛主席对他的这一评价。稼祥同志听了毛主席的这一公正评价，也极为感动。

王稼祥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尽力尽责的一生。稼祥同志虽离我们已有十年之久，但他的崇高品德、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学习的、继承的。

*

建国以后，1949年底，吴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直到1966年12月12日他88岁逝世。吴老作为人民教育家，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为中培养了一大批党的干部，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以后，吴老在成都高师、重庆中法大学、海参崴远东工人学校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到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又为革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毕业生，为党输送了好几代干部，真是桃李满天下。吴老确实是当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巨擘。

吴老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他的事迹甚丰。建国以后，吴老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他又是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在二十年代末，就在苏联远东地区，试用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为中国华侨扫盲。四十年代，他在延安主持并亲自用拼音文字在农村进行扫盲试验。建国后，他还到各省积极试验，推行文字改革工作，不遗余力。

吴老为革命立下那么大的功劳，但却始终那样谦逊谨慎，艰苦朴素。吴老是一个勤于思索而又慎于言行的。在延安和北京参加各种会议时，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发表意见。他爱同刘伯承等同志谈心。有时也同我谈一些，交流思想。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进北京后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对人民的师生无比关心，不顾自己高龄，还亲自去听课、讲课、查错。我觉得他自奉太薄，过于辛劳，曾劝他说：“您年岁太高，身体又不好，有些事可以少管些。”可是，他说：“不去不碍啊！心里放不下！”这是一位多么好的长者、师长啊！

吴老从参加辛亥革命起，一生坚持革命，总是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不断跟着时代前进。他一生勤奋工作和学习，孜孜不倦，从不松懈。他作风民主，和蔼可亲，十分关心爱护干部。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贯有益于革命，是我们的光辉榜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楷模。他的名字将与人民同在。

